

辽灭亡后，150万契丹人去了哪里？

■ 婉清秋

契丹是曾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建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辽帝国，与宋、金三足鼎立。但随着辽国灭亡，曾经的贵族耶律氏、萧氏也迅速隐入历史的尘埃中。那些在战火中生存下来的契丹人去了哪里？

那些改名换姓、融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后裔，又是如何一步步在历史中重塑身份、延续文化的？

大漠孤烟

契丹人从马背上走来，原本只是隐匿在历史缝隙中的一个鲜卑后裔部族，和众多北族一样，被北魏、隋唐诸朝收编、迁徙、同化。但契丹不同于其他游牧民族，他们并没有被时代轻易抹去，而是在不断的融合与博弈中，悄然孕育着一场帝国的崛起。

契丹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北魏的史料。那个时候，他们不过是一个依附于中原王朝的小部族，生活在今天内蒙古一带，夹缝求生。北魏政权为了安抚边疆，在契丹部落中设立都督府，赐姓“李”，希望通过名义上的拉拢，实现对其的控制。但表面臣服的背后，契丹人从未忘记独立自主的梦想。他们学习中原礼制，也吸收唐朝的军事制度，在服从与反抗之间，酝酿着变局。

唐太宗李世民政治下，契丹族首领曾多次进京觐见。随着大唐盛世的逐渐衰退，契丹人看清了时局的裂缝。他们开始向西扩展地盘，频繁侵扰邻近部族，默默积蓄力量。

唐末群雄并起，黄巢起义、藩镇割据，一时间九州动荡不安。对契丹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阿保机，这位契丹历史上最重要的统帅，就在此时横空出世。

耶律阿保机以卓越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才能，整合了分裂已久的契丹各部。他摒弃以往部落贵族之间相互猜忌的传统，建立起以皇族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他的领导下，契丹人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权，契丹国。他不像过去的部落那样满足于封号和贡品，而是主动出击，开始对中原局势进行干预。中原的权力真空为契丹打开了一扇门。

石敬瑭，这位后唐的节度使，为了争夺皇位，不惜引狼入室。他向契丹求援，条件是献出包括今日北京、山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而言，它象征着真正迈入华夏的门槛，是一个游牧民族变身中原王朝的标志。于是，契丹倾国出兵，帮助石敬瑭击败敌人。

事成之后，石敬瑭果然亲手奉上燕云十六州。此举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也彻底改变了契丹的命运。这片土地让契

丹第一次深入汉地，接触到中原复杂的行政体系、城市结构与文化规则。

耶律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更是乘势而上，于是契丹正式改国号为“辽”，建立了一个横跨草原与中原的庞大政权。辽国的建立是契丹人智慧与野心的集中体现。

他们一方面维持着传统的游牧制度，在草原上保留原有的部落贵族制度，另一方面，又仿照中原设立州府制度，任用汉人官吏治国，形成了独特的“北面官制”。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双轨制模式，既体现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又保留了自身的民族根基。

辽与宋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宋初对辽的燕云之地垂涎三尺，却屡次北伐无功而返。最终，两国在澶渊订立盟约，以岁币换取边境和平，契丹人自此获得了中原王朝“承认”的皇帝身份。

辽国达到了鼎盛时期，疆域东到大海，西至流沙，南抵长城，北越大漠，一时风光无限。但盛世总有尽头。随着女真族在东北崛起，辽国的统治开始动摇。天祚帝昏庸无能，荒于政事，耽于享乐，对内压迫对外失策。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不仅迅速崛起为东北新势力，还联合宿敌北宋签订“海上之盟”，共同夹击辽国。

公元1125年，辽国在内忧外患下彻底崩溃。天祚帝带着残兵败将仓皇出逃，曾经号令天下的契丹皇族，就此成为战败者的俘虏。

辽亡了，但它背后的契丹人并没有随之消失，他们继续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生存之道……

建西辽

在金国军队的铁蹄之下，宫廷被焚，城池被掠，平民百姓更是惨遭血洗。在这场劫难中，耶律大石成为契丹最后的希望。这位皇族出身的贵族，在辽帝国濒临崩溃之际，并未选择投降，而是毅然带领剩余的契丹精锐，踏上西行之路。他知道，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契丹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他们一路向西，翻越辽西丘陵、穿过大漠戈壁，辗转至西域中亚。长途跋涉的队伍中，有老弱妇孺，也有战败的将士，有皇族子弟，也有部落首领。在流亡途中，耶律大石展现出远超常人的政治与军事智慧。他既是逃亡者中的领袖，也是未来王朝的奠基人。

公元1132年，在中亚楚河流域的叶密立，也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耶律大石正式称帝，建立了西辽，史称“后契

丹”。这个政权虽然远离中原，但却延续了契丹的制度、文字和文化，也成为契丹最后的精神归宿。耶律大石效仿辽制，继续实行双轨制的“北面官”体系，并推行契丹小字，维持契丹贵族的统治地位。

短短80余年间，西辽政权历经六帝，虽多战事不断，但总体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可命运注定了，西辽注定只是契丹最后的余晖。

公元1218年，蒙古铁蹄席卷西域，西辽被彻底覆灭，契丹人在中亚的最后据点也随之坍塌。此时，那些未能随耶律大石西迁的契丹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许多契丹人选择投降金朝，改换门庭，甚至在金政权中获得一席之地。

他们不再自称“契丹”，而是刻意抹去过往的痕迹，换上汉姓或女真姓，努力融入新政权中。这是不得已的生存之策，却也意味着祖先荣光的渐行渐远。还有一些契丹人北走蒙古草原。

蒙古人崇尚骁勇，看中战功，契丹人在此重新找回了曾经的骑射英勇与战场荣誉。成吉思汗时期，不少契丹人被编入探马赤军，成为征服世界的一部分。当忽必烈大军踏入云南高原时，契丹人也随之南迁。他们被安排屯垦戍边，定居于滇西一带。从帝王将相到农夫士卒，契丹人的身份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转变。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契丹后裔逐渐淡出了主流史书的视野。他们的语言、服饰、宗教一一被替代，但某些风俗、某些姓氏，却如深埋的化石，在特定时刻悄然显现出民族的记忆。

隐姓埋名

在古老的契丹语中，“耶律”与“萧”不仅仅是姓氏，它们象征着皇族的荣耀与贵胄的血统，是契丹人顶在头上的无上荣光。但随着辽国的覆灭，这两块金字招牌却成了唾弃自己命运的烙印。只要顶着这个姓氏，哪怕只是远亲、庶支，也注定难逃被清算的厄运。

危亡之际，契丹人做出了最艰难的抉择：隐藏身份，改姓换名。耶律阿保机的后裔们，在这一时刻，第一次不再以“耶律”为荣，而是将自己的姓氏化作更平凡的“阿”、“莽”、“蒋”。“阿”姓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迁云南的契丹军户群体。

据族谱记载，这一姓氏并非随意取用，而是取自“阿保机”的第一个字，象征着他们对祖先的纪念与延续。这种以先祖名讳为姓的做法，虽不合中原礼制，却充满契丹人特有的图腾意识。但“阿”姓终究难以掩饰其异族痕迹，尤其在日益汉化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

到了明初，云南地方已经逐步实施“改土归流”，朝廷大力推行中原制度，企图彻底融合边疆少数民族。所以，“阿”姓契丹人不得不再次改变，一个更具地方语境、也更易被接受的新姓氏应运而生，那就是“莽”。“莽”这个姓氏在滇西一带并不陌生。

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它常被用作对部落首领或长辈的称呼，带有“首领”与“尊者”的意味。契丹人选择“莽”为姓，既是为了让自己更易于被当地民众接纳，也是一种巧妙的身份映射。这一阶段的改姓，不再只是为了逃命，而是一种主动的文化伪装。

他们将过往身份埋入土壤，把新的名字融入土地，与彝、傣、布朗、佤等族群长期杂居。逐渐地，他们不再以契丹自居，而是成了云南山区的“本人”，一个不属于任何官方民族分类的模糊人群。

明神宗时期，改姓的第三轮潮流悄然到来。这一次，不再是出于逃亡的恐惧，而是在政治与文化双重推动下的主动融入。朝廷为了更好地治理边疆，实施“改夷为汉”政策，迁入大量中原移民，要求少数民族放弃“夷姓”，认汉姓。对于那些已在云南扎根数代的契丹后裔而言，顺应这一潮流既是生计的保障，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门票。于是，“蒋”这个姓氏浮现出来。

相比“阿”与“莽”，“蒋”无疑更接近中原正统文化，既能遮掩异族身份，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接受度。契丹人以此完成了从“异族贵胄”到“普通百姓”的身份蜕变，从草原游牧走向农耕村寨，从金戈铁马走向锄禾当午。在许多蒋姓家谱中，依然保留着对“耶律阿保机”的追溯，甚至部分家谱在序言中直接写明：“耶律始祖，阿姓改莽，明初更为蒋氏。”他们并未完全切断与祖源的联系，而是在时代洪流中选择了另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继续传承。在由旺乡木瓜榔村的蒋氏宗祠中，这种“半公开”的文化传承尤为显著。祠堂门前的对联写着：“耶律庭前千棵树，莽蒋祠内一堂春。”短短十四字，道尽了三姓合一的历史演变。更为独特的是，这座祠堂的正门并不如中原建筑那般坐北朝南，而是朝东而开。这一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透露出深厚的文化渊源，契丹人有“朝日”的习俗，认为东向可迎朝阳，是最尊贵的方向。

几百年过去，这种信仰依然藏在建筑朝向中，悄无声息却根深蒂固。也许在某个云南村落的集市上，那个挑水的“蒋大哥”，那个种地的“莽二嫂”，那个读书的“阿小弟”，正是契丹王朝血脉的延续。

他们以新身份安身立命，用旧记忆默默传承，在隐姓埋名中，完成了从帝国遗民到普通百姓的千年跨越。

宋词里的山水意境

□子安

宋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宋词中，山水意境作为一种常见的题材，被词人们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情感。从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中“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的静谧描绘，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浑气势，词人们通过不同的笔触展现了各自心中的理想景观和精神世界。这些作品中的山水不仅仅是自然景色的再现，更是词人情感的投射和哲思的反映。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且经济发达的朝代，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地位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相对安逸，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文化艺术的创作。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宋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宋代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的兴起为文化娱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词这种适合吟唱的文体因此得到了极大推崇。

宋代的文人不仅继承了前朝的文化传统，还在诗词创作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他们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自然风光，并通过这些自然意象来抒发个人情感和政治失意。比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

中通过描绘长江和赤壁的景象，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的缅怀和对人生短暂的感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促成了宋词中山水意境的发展，使其成为词人寄托情怀的重要方式。

宋代的哲学思想对宋词中的山水意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程朱理学和禅宗思想的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通过观察自然界的事物来获取知识，这一理念促使文人墨客们更加关注自然景色，并将其融入词作之中。例如，朱熹在《观书有感》中写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种细腻的自然描写体现了理学思想中对自然万物的关注和理性分析。禅宗思想则提倡“心物合一”，主张通过内心的宁静来实现对自然的融合。这种思想影响了词人们对山水的描绘方式，使其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抒发。仲殊的《柳梢青·吴中》即是典型的例子：“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光，墙头红粉，深院谁家。”通过简洁的语言营造出一种孤独而寂静的自然意境，反映了禅宗“心物合一”的境界。

宋词中对山水景色描绘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独特

性。词人们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山川河流、风雨云雾等各种自然景观，使读者如临其境。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对长江和赤壁的生动描写便是典范：“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段描写不仅突出了自然景观的宏伟壮丽，还巧妙地结合历史事件，引发读者对古今往事的无限感慨。欧阳修在《踏莎行》中写道：“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通过对旅途景色的描写，反映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家乡的思念。

在宋词中，词人们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意象来构建山水意境。这些意象不仅包括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流，也包括细腻精致的花草树木。常见的意象类型有：江水、湖泊、高山、森林、云雾、春风、秋雨等。譬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使用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江水的奔腾象征历史的流逝；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写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通过夜晚景象衬托英雄失意的情感；李清则在《如梦令》中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运用风雨意象表现内心的

孤寂与冷清。这些意象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还传递出词人的情感和心境。

宋词中的意象组合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词人通过简单的排列组合创造意境，有的则通过复杂的联想和比喻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组合方式的创新使得意象之间产生互动和共鸣，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感染力。苏轼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将“似花还似非花”的杨花与其他自然意象巧妙组合，既写了杨花的形状和动态，又寄托了自己复杂的情感。柳永则在《八声甘州》中写道“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通过“暮雨”和“清秋”两个意象的组合，传达出了一种清新脱俗的感受。周邦彦在《苏幕遮》中写道“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通过“沉香”、“鸟雀”等意象的组合，创造出一种宁静而悠远的意境。

宋词中的山水意境是宋代文人情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结晶。它既有对壮丽山河的赞美之情，又有对柔美湖泊的钟爱之意；既有对历史英雄的追忆之感，又有对个人命运的沉思之思。通过这些山水意境的描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和审美追求。